

文艺批评新视野丛书

丛书主编 黄继刚 胡友峰

变革中的焦虑：
十七年
文学探寻

吕东亮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文艺批评新视野丛书

丛书主编 黄继刚 胡友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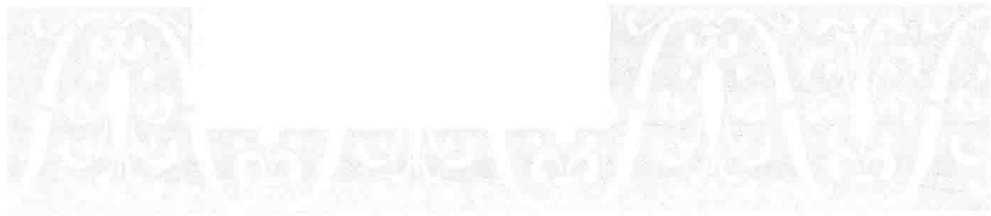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研究」(14CZW011)阶段性成果之一

变革中的焦虑： 十七年 文学探寻

吕东亮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革中的焦虑:十七年文学探寻/吕东亮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9

文艺批评新视野丛书/黄继刚,胡友峰主编

ISBN 978-7-307-20539-0

I.变… II.吕… III.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8686号

责任编辑:李琼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汪冰滢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鑫佳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5.75 字数:225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539-0 定价:4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黄继刚、胡友峰两位博士主编了一套书系，让我为之写一个总序，我欣然从命，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对于该书系的内容比较感兴趣；其次是觉得该套书系的作者视角比较有特点。

现分别来说：其一，该套书系的内容是“文艺批评新视野”，这个视角符合我们文艺发展的时代性。众所周知，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是特定经济社会之反映。当前时代已经进入到后现代社会，是对于现代之反思与超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名称来形容这个后现代社会，可以称之为“共生的时代”，以之与传统的各种“中心论”相对；可以称之为“生态文明时代”，以之与传统的工业文明时代相对；可以称之为“网络时代”，以之与传统的纸质文化时代相对；可以称之为“东方文化复兴时代”，以之与传统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相对，还可以称之为“跨文化研究时代”，以之与传统界限明晰的研究相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该套书系几乎包括了上述各个方面的内容，黄继刚的《空间的现代性想象》以文学中的景观书写为研究对象，可谓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研究；胡友峰的《媒介生态与当代文学》是对于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研究对象和审美属性的探讨；戴孝军的《和谐与超越：中西传统建筑审美文化比较》与何飞雁的《彩调的审美文化研究》也是一种跨文化多元性研究；康毅的《露西·伊丽格瑞近期思想研究》与何书岚的《中国诗学中的人权思想研究》都是对于人之生存状态的一种开放式研讨；而李鹏飞的《中古诗歌用典美学研究》则是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的全新探赜。总之该套书系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全新视角，也给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带来了清新的学术气息，这无疑是值得鼓励和倡导的。

其二，是该套书系的作者都是“75后”、“80后”的年轻博士，这一代学者是将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生力军，也是文艺理论研究的未来。而我们都已经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真的是喟叹日月如梭，时光荏苒，像我这样毕业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学人都早已经步入老年，更遑论我们的师辈。因此，新的一代与一代新人的崭露头角已经是时代精神与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本丛书的作者们就属于这样的新一代，他们在本套书系中表现出来的锐气才力与研究实力正是这些新人们发展前景的美好表征。我期待并盼望着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快速成长，飞得更高，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就。这也是我在济南三伏天的炎热之中写了如上寄语的真实用意所在。

曾繁仁*

2016年7月18日

* 曾繁仁，山东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艺术学评议组召集人，长期以来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组中国语言文学、新闻学、艺术学组组长。

写在前面的话

我们当下已经身处一个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科技似乎从未停止过大规模前进的步伐，而文艺的地盘逐渐被蚕食并日益边缘，科学实用的意向将人文虚致的精神挤到了墙角，“爱因斯坦遭遇马格利特”^①的强弱悬殊已经越来越不成比例。如今我们将文学的中心/边缘、实用/无用等问题拿来讨论，这本身业已昭示出现代文化的基本困境：它时时处在工具理性和实用精神的压迫之中，所为甚微。这一情形也正是目前文艺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逼仄现实。文艺研究活动作为一门“学问”和一种特殊的审美情感，可能并不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也无法参与到社会形态的具体建构过程当中，它更多的是提供了关于人之存在的不同价值观念。所以，尽管粗粝的生存需求和社会压力时常将文艺研究者从思想的高峰拽下，抛入到现实环境的无尽撕扯当中，但是“学问”本身自有其意义。胡塞尔现象学曾经帮助我们区分界定了两个概念：指明和证明，就文艺研究活动而言，其并不证明什么，但是它时时在向我们指明，这些为它看见和指明的东西，就是可能性，即人生、世界何以展开、如何展开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并非要将自己的观念视为唯一原则而强加于人，而是提供一种内省的思想方法来帮助我们破除灵魂的栅栏，并使得自我呈现出应然的状态。借此，我们保持一份“未敢翻身已碰头”的谦逊和惶恐，在自己营造的精神天地和思想涟漪中自得其乐，在书斋当中的“玄思妙想”、“坐而论道”都可谓

^① “爱因斯坦遭遇马格利特”（Einstein Meets Magritte）是199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跨学科学术研讨会，其旨在探究不同学科的边界以及对话交流的可能性。

是对当下甚嚣尘上之功利关怀的最好回应，毕竟审慎执着的学术追寻仍然要比琐碎无序的日常生活荣耀得多，正如尼采在《快乐的智慧》中所言，假若能参悟读懂自己的灵魂，自身那种须臾不可或离的意义将徐徐呈现，而“生命之于我们，意味着不断将自身以及所遭遇的一切转化为光和火”^①。就此而言，文艺研究也许不会使我们富有，但却会使我们终得自由。

文艺研究者素以学术研究中的“思”、“史”、“诗”视为自身的存在方式，并在一种不知足的引颈前瞻氛围中昭示出应对未来的能力。而学术研究上的承传有自、薪火绵延更是需要吁请青年文脉的加入，尤其是需要聆听“75后”、“80后”学者所发出的声音。就此，编者虽不敢妄言此丛书会“雏凤清于老凤声”，但是年轻学者们不囿于陈说、溯迎而上的努力还是应该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就这套《文艺批评新视野丛书》而言，语境化的分析和历史性的考察是我们甄选文丛时的唯一判断标准。所谓“求理于问答之外”，作者们大多能够透过浓重的历史烟雾来重新论证理论之自明性，其论著或者是隐含着一种新的提问方式，或者是用新方法来开启新视野，或者是以新角度来探讨新问题，整体上兼具学术差异性和理论互文性之特征，而作者们许多篇章的文本分析巨细靡遗、秘响旁通，也堪称精彩。编者希冀本套丛书能够抛砖引玉，在学界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和学术回应，当然也因编者缺乏经验，谬误在所难免，还请业内方家批评指正。

最后，非常感谢康毅、李鹏飞、何书岚、何飞雁、戴孝军、潘国好、白宪娟等好友的信任，诸君大多师出名门，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学术训练，他们勤勉刻苦，笔健如犁，耕耘不辍，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当编者发出邀请，各位作者欣然将各自的博士论文纳入到我和友峰兄策划主编的这套丛书当中，孔子云“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少陵云“文章有神交有道”，此谓也。

^① [德] 尼采著，王雨译：《快乐的智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我想接下来应该是编者宣读完开场白之后，默默退下，而诸位优秀的思想演员将在这之后陆续登场亮相——

黄继刚 胡友峰

2016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诗形式讨论中的“传统”问题.....	1
一、革命抑或改良：面对新诗传统的两种态度.....	2
二、格律化渐趋成为讨论中的强势话语.....	8
三、旧诗的复活与“传统”的重释.....	13
第二章 “美文”传统的浮沉 ——十七年散文批评史述论.....	18
一、复兴的初潮与批评上的含混.....	19
二、再度复兴中的理论批评收获：文体意识与个性风格的自觉.....	22
三、复兴的挫败与批评风向的转移.....	34
第三章 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十七年长篇小说批评的内在理路.....	38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批评界长篇小说批评的理路.....	39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批评范式的确立.....	47
第四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批评界对话剧的正规化追求.....	54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批评界对话剧的正规化追求.....	55
二、话剧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实践.....	59
三、独幕剧的提倡及其问题.....	65
第五章 批评的抱负与温情的细读 ——何其芳《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史意义.....	68

一、《红楼梦》研究与文学批评新范式的创立	68
二、《红楼梦》作为“世界文学经典”之建构	73
三、“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分析作品”：文本的细读与批评的 温情	77
第六章 《夜读偶记》与《燕山夜话》：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革命知识分子的夜	86
一、“雪夜闭门读禁书”	86
二、科学：不曾中断的启蒙	89
三、时代与文体	95
第七章 批评论争事件中的文学场 ——重审十七年文坛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 的讨论	99
一、论争的缘起	99
二、最先出现的两篇评论文章	102
三、论争中的文学场观察之一：中央文艺界和地方文艺界 的关系	105
四、论争中的文学场观察之二：专业批评家和业余批评者 的关系	112
第八章 “胡风派”的鲁迅研究及其与主流派的深层歧异 ...	118
一、“胡风派”鲁迅研究的状况和命运述略	119
二、主流派的鲁迅论述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策略	122
三、问题的聚焦点：《阿Q正传》与《野草》	128
四、歧异与中国革命文化现代性内部的纷争	134
五、余论：关于胡风研究中一个问题的思索	139
第九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论1954年批评界对路翎的批评	141
一、走进“当代”的路翎	141

二、非同寻常的 1954	143
三、批评的特征与诉求	148
四、路翎的反批评与“胡风事件”	151
第十章 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地域色彩”问题	155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探讨与“地域色彩” 界限的划定	155
二、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繁荣证明的“地域色彩”	159
三、十七年文学的地域问题蠡测	165
第十一章 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文本解读问题 ——兼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的必要性	167
一、重读文本：文学史研究的突围策略	168
二、寻找异端的冲动与现实刺激之后的调整	170
三、需要警惕的与需要完善的	174
四、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的必要性	178
第十二章 《欧阳海之歌》与“文革”文学的发生问题	181
一、新人理想的实现	181
二、小说文本的隐喻色彩	184
三、军队文化的胜利	186
四、创世激情下的新文学	189
五、“文革”文学发生问题的再讨论	192
第十三章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部“问题小说”	197
一、为“问题”的小说与内心焦虑的释放	197
二、文本间的犹疑	200
三、问题小说的模式和命运	206
第十四章 秦牧散文的文体构造与源流	210
一、华侨身份、编辑生涯、岭南处境	210

二、秦牧的文体改造与坚持及其时代意义·····	213
三、考镜源流：从周作人到秦牧再到余秋雨·····	218
第十五章 略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古典美学资源	
——以孙犁、汪曾祺为例·····	221
一、古典美学流风余韵的顽强存续·····	221
二、孙犁对儒家美学的探索和实践·····	223
三、汪曾祺对道家美学的阐释和表彰·····	228
四、当代文学批评中古典美学复兴之可能·····	231
参考文献 ·····	234
后记 ·····	240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诗形式讨论中的“传统”问题

新诗的诞生，是以形式上对古典诗歌的反叛为重要基础的。但是，在新诗的发展历程中，诗歌的形式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确认，形式问题成为制约新诗发展、成形的核心问题，也是新诗存在合法性能否取得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至今仍然存在。新诗形式上的这一“未完成性”以及伴随而来的焦虑，^① 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新诗的形式焦虑虽然存在，而且一些诗人为了化解这种焦虑对新诗形式作了认真而富有成效的探索，但总体来讲，由于诗界的“无政府状态”和坎坷多艰的国族命运，新诗形式探索所积累的成果并没有得到诗人们的认同，关于新诗形式的主张事实上呈现多元状态。这种多元化的、无政府化的状态对于企求一体化的共和国政权及其文化力量而言是不能容忍的，因而新诗的形式焦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变得更为剧烈和集中。在组织上渐趋一统的中国诗歌界为化解这种焦虑所作出的努力是艰苦卓绝的，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意味深长的。这种努力及其呈现的困境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诗歌问题的讨论中。可以说，形式焦虑及形式探索是十七年诗歌评论的核心问题。

当然，十七年时期的诗歌评论并不完全是形式探索。事实上，对于诗人诗作的思想政治方面的评判仍然是诗歌批评首先考虑的方

^① 关于新诗形式的“未完成性”问题，目前诗界存在着诸多争议。本书认同“未完成性”这一说法，主要是从诗歌和新文学格局中其他文体相比较的角度而言的。本书所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一概念，指的是从1949年到“新民歌运动”发生的这段时间。

面。但相对于形式而言，思想政治方面的批评虽然显得严肃甚至凌厉，但一般问题比较明朗，几乎不大会引起争议，因而虽然重要，但并不是诗歌批评的焦点，对于专业的影响较大的批评家而言尤其如此。诗歌批评中的政治考量，虽然常常和形式探索缠绕在一起，但有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非专业、群众性、政治性的批评文章中，政治考量往往呈现出自足的面貌，并不涉及诗歌形式问题。总的来说，诗歌评论界真正焦虑的是尚未具备确定性和共识的诗歌形式问题。

一、革命抑或改良：面对新诗传统的两种态度

1949年7月，中国文学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艰难转折，走进了当代，并且和其他事物一样，呈现出万象更新的面貌。此时的文学界普遍忙碌的，是各种文学力量、各种文学资源的整合问题，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建构的过程。这一时期，中国文艺界创办的主要期刊，组织和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文学问题的讨论。新诗问题的讨论就是这些讨论中值得注意的一场。

1950年年初，《文艺报》组织了关于诗歌问题的讨论，当时的参加者有萧三、田间、冯至、马凡陀、贾芝、邹荻帆、林庚、彭燕郊、力扬、沙鸥等，其文章集中发表在《文艺报》第1卷第12期，分别为《谈谈新诗》《写给自己和战友》《自由体和歌谣体》《诗歌与传统的关系》《对于诗的一点理解》《关于歌颂》《新诗的“建行”问题》《诗质和诗的语言》《关于诗》《谈诗的偏向》。何其芳当时因为忙于别的事情，没有参加讨论，他随后为这场讨论而撰写的文章《话说新诗》发表在《文艺报》第2卷第4期。这一讨论就其代表的广泛性而言，是程度较高的。萧三、田间、何其芳等是解放区诗人，冯至、林庚等是国统区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诗人，力扬、彭燕郊是七月派诗人。更为重要的，他们都是一些具有创作成绩的诗人，对诗歌的理解都有切身体验。诗人论诗，这是诗歌史上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十七年，这一现象不仅没有因为政治的挤压而消失，而且更加纯粹化了，诗人自动地成为谈诗的权威，甚

至一些不具有诗人身份的文艺界领导人谈论诗歌的文章，也往往采用“门外谈诗”的形式。^①这次讨论是新诗问题的一次集中暴露。新诗与古典诗歌、民歌脱节的问题，新诗和群众语言的隔膜问题，新诗的体式问题，新诗人的立场问题，诗的语言问题，诗歌与传统的问题，都被认真地提了出来。这些问题当中，较为核心的或者说较为本源性的问题是诗歌群众化问题和新诗自身的体式问题。

新诗大众化问题，即新诗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是左翼文艺界一直关心的问题，也是解放区文艺传统的一个重要质素。从群众化意义上来讲，由《文艺报》组织的这场讨论可以视为解放区文学活动在1949年后的延续。参加讨论的诗人都或多或少地对新诗大众化表示了赞同、提出了建议。但讨论者对新诗大众化问题的艰巨性也有清醒的认识。文章被列在首位的资深革命家诗人萧三就曾引用托尔斯泰的话后表示：“我认为要使诗歌真正新鲜活泼、大众化，只有用新文字来写诗才有可能。中国的汉字实在是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最大的障碍物。”萧三的主张明显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界瞿秋白等人取消汉字、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的思路，但在当时不免显得不切实际。萧三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诗歌界当务之急便是为新诗寻找一个满足现实需要的形式。他紧接着谈了新诗技巧与形式的不足以及经典的缺乏，新诗的体式问题在这里显得十分迫切。萧三对新诗问题的估计是严重的，他也明显地期待一场新诗的大革命。在萧三这里，新诗的大众化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新诗的形式问题。

萧三关于新诗体式的焦虑，在其他讨论者的文章中也可以被感受到。但是，并非所有的讨论者是仅仅在新诗大众化的意义层面上展开的。这方面较为值得注意的是林庚和何其芳。林庚的文章《新诗的“建行”问题》从民族形式问题谈起，指出必须对五七言形式作“批判地接受”，“要把五七言形式的传统同今天语言文字（也即口语或白话）的发展统一起来”。他提醒诗歌探索者不要仅

^① 比如邵荃麟在“新诗歌发展问题”讨论中的文章《门外谈诗》，《诗刊》1958年第4期。

仅注意行与行之间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建立一个恰当的诗行的问题。在这次讨论中，林庚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表达自己的正面的建设性的看法。几个月后，林庚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九言诗的“五四体”》一文，^①在文中，林庚结合自己的探索实践，提出了“九言诗”“五四体”的形式，即一个诗行最好由九个汉字组成，九个汉字分成两组，四个字和五个字各一组。林庚认为这一形式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趋势，也符合民族化、大众化和“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文艺思想。林庚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他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新诗形式的探索，意在为新诗寻找到一个普适的形式。在探索过程中，他逐渐摆脱向西方寻找借鉴的路径，而是从口语化的民歌中受到启发，提出“九言诗”这一富有希望的新诗体式。还有一点，林庚并没有特别指明，即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诗歌的教学与研究，对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理解。^②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他对自己新诗探索成果的自信。需要指出的是，林庚长期在高校任教，不大可能深切感受到新诗大众化、民族化的焦虑，他对新诗形式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新诗人寻求普遍的诗歌形式的焦虑，是对新诗过分自由化以致取消诗等不良现象的担忧。这一焦虑的催生，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林庚的诗学理想。林庚喜欢唐诗，迷恋“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表现在形式方面就是十分推崇五七言那样的典型诗行。所谓典型诗行，林庚的解释是：

典型诗行乃是意味着这样诗行的出现既是“这一个”，又是亿万个，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正因其如此，诗歌的形式

^① 林庚：《九言诗的“五四体”》，《光明日报》1950年7月12日。

^② 林庚的文学史观主要体现在其《中国文学简史》上。林庚在回答别人提问时曾对自己的文学史观作过解释：“如果说特色，那就是我没有只是平实地介绍作家、作品，而是把中国文学史看做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由童年而盛年再到衰老，然后是新生……历代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多着重在对过去的研究上，我写文学史着眼点却是在未来，是为新文学服务的。”见林庚：《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162页。

才不是对于内容的束缚而是有助于内容的涌现。五七言诗行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无可争辩的经验和证明。

典型诗行因此是有严格规律的诗行，格律本身就意味着要求严格，否则它的“这一个”就不能成为亿万诗行的普遍化身。正如典型的银幕乃是方形的，可宽银幕就不行；而这个方形银幕的第一次出现，也就意味着亿万个同样银幕的行将涌现。^①

所谓“典型诗行”，很明显借用了左翼文学中的典型论的理论思路，此时的林庚很善于征用民族化、民歌体、大众化等流行的文艺的政策性资源，不过其理论的真诚性并未受到损失。晚年的林庚在回忆时说：“它（九言诗的五四体）仿佛就正是我要寻找的诗行，我当即把我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创作中去。”^② 林庚的诗论主张，从早年到晚年，是一以贯之的，其间几乎没有变化。这是我们在探讨林庚诗论特别是十七年时期的林庚诗论时，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因此，就这次讨论而言，林庚的立场和出发点和萧三等人是有差异的，只不过注重古典经验的林庚和主张文学民族化的萧三诸人，在这里显得有些殊途同归。

与林庚相似的是何其芳。何其芳后来参加讨论的文章《话说新诗》因为是单独发表，所以篇幅要比前面参加讨论的文章长许多，触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在表达了“新诗首先还有一个内容问题”，要有“具体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强烈的诗的情绪”之类观点之后，何其芳把探讨的重心放在了形式上。何其芳强调应该防止两种偏向，即：借口“内容决定形式”而否认任何艺术形式有其本身的传统，“过分地不必要地违反传统常常就会脱离广大群众”；

^① 林庚：《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 页。这段话虽是林庚后来的追忆性论述，但鉴于林庚的诗学观点前后并无变化，所以本书采用这一段论述。

^② 林庚：《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 页。